

福建通史

明 清

徐晓望 主编



第四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通史 · 第四卷

明 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建通史. 第4卷, 明清/徐晓望主编; 徐晓望撰.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3
ISBN 7-211-03252-9

I. 福... II. ①徐... ②徐... III. 福建省—地方史—明清
时代 IV. 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2934 号

福建通史

FUJIAN TONGSHI

第四卷·明清

主 编: 徐晓望

责任编辑: 林小影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21

字 数: 539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11-03252-9

定 价: 3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顾问: 刘学沛 郑学檬 陈支平

主编: 徐晓望

本卷撰著: 徐晓望

福建通史 第一卷

——远古至六朝

福建通史 第二卷

——隋唐五代

福建通史 第三卷

宋元

福建通史 第四卷

明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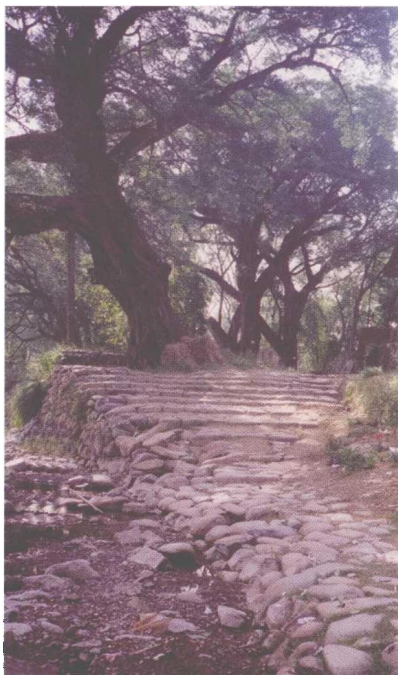
福建通史 第五卷

——近代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柔远驿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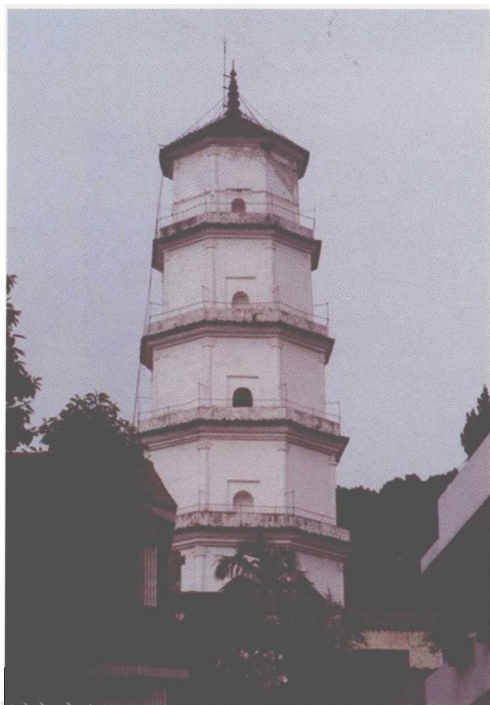


福安廉村明代古码头



福州开元寺明代建筑

福州于山白塔



漳州明代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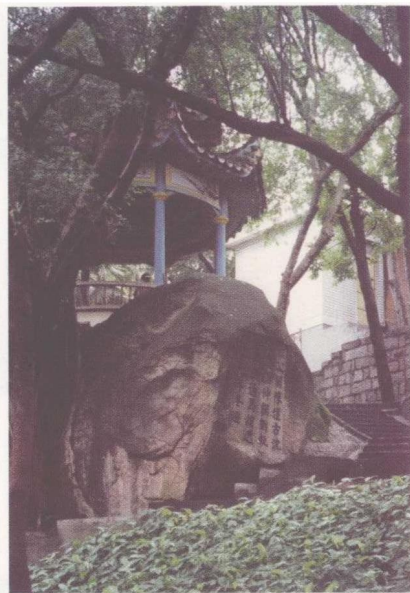
福州明代古城墙遗址



明代崇武所城墙遗址



郑和所铸铜钟



福州乌山为纪念番薯自海外传入福建而建的先薯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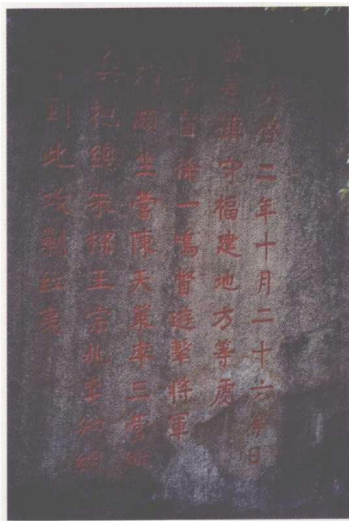


郑和宝船模型



福州于山为纪念戚继光而建的戚公祠

明代木雕赵公明像



厦门鸿山寺有关“攻剿红夷”的碑刻



郑成功读书处



明代德化窑双螭耳三足炉

泉州文庙



建瓯古城遗址——通济门



崇安县（今武夷山市）馀庆桥



福州河口的万寿桥（清康熙九年修复）



河口万寿桥碑（局部）



明代漳窑如来佛像

厦门万石岩为纪念清军在澎湖水战中
阵亡将士所立的碑



序

福建，古之闽越，秦时曾置为闽中郡，唐代因统有福、建等州，置福建观察使，福建之名，遂相沿至今而不改。此地东濒大海，西以武夷山脉与江西为界，南邻粤东，北与浙省相接。山水人文之盛，世所共睹。其北境有武夷九曲，丹崖碧水，举世称奇；其南有戴云高峰，直插云表，千载悠悠。若夫李纲之忠，抗金人于河上；郑氏之雄，复疆域于海东。朱文公集理学之大成，林文忠焚鸦片之丹心，驯至近世，公忠体国，革故鼎新，人才济济，咸在青简。是则福建之史，历时悠久，内容丰富，不可不知也。如今刘学沛倡立、徐晓望暨诸位同事撰成的《福建通史》一书，溯及远古，迄于当代，俾能通览福建之古今，而求其演变之轨迹，以图奋发于将来，是大有益于学界也。顷来属序于我，故谨书数言于此。

二千年之元月，韩国磐志于榕书屋

前 言

《福建通史》共五卷。第一卷从远古时代一直写到六朝时期，这一段历史也可简称为“上古”；第二卷为隋唐五代；第三卷为宋元；第四卷为明清；第五卷为近代。为了使读者在进入福建史时有一个整体的印象，特对福建的历史地位以及撰写本书的情况作一些介绍。

自古以来，福建就是一个区域性特征十分显著的省份。福建三面环山，一面是海，闽江发源于中北部的大山，将全省三分之二的区域联系在一起，剩下的东南沿海区域也能以海洋为交通线，相互联络。福建的河流大多自成体系，境内多是大山，这种地理环境使闽人不方便与内地省份联系，因此，福建在历史上形成浓郁的地方特色，只要进入福建辖区，便可以感受到不同于其他省份的风情。在唐朝以前，朝廷曾将福建部分区域划归江西，也曾划归岭南，历史上她还曾是江浙的一部分，但是，统治者很快发现，这都不便于管理，最后还是让福建自成一体。自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设立福建经略使以后，福建便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行政体系而存在，历唐宋元明清，迄于近代，其间虽有整体划归其他省份的时候，但总体上还是以独立的时候为多。在唐末是威武军，在宋代是福建路，在元代是福建宣慰司，又曾是福建行省，明清以迄现代都是福建省。像福建这类长期自成一体的省份，其实不多。

福建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福建史研究也就是地方史研究。但仅从地方史研究的角度来解释福建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从中国史与世界史的高度来把握福建史，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五千年以来福建史发展的本质。福建在历史上有几个特点令人瞩目，第

一，她是东南区域南方文化较早发源的区域之一，在福州附近发现的昙石山文化展示了始于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文化，对研究中国南方水稻文化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福建原为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汉族南下福建后，与当地民族进行了文化与血缘的交融，新的福建成为汉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也成为汉文化在东南区域的主要支柱，历史上广东、台湾等地汉文化的发展，与福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福建境内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在汉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第三，福建在历史上是一个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福建沿海地区早在南宋时期就因人口众多出现了粮荒，为了弥补当地的粮食缺口，福建人从广东与江浙运来粮食，向这些地区出口茶叶、糖、木材等商品，又将产于浙江的丝绸、江西的瓷器运至海外出售，从而拉开了中国沿海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序幕。第四，从宋朝一直到清代，福建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对外贸易省份，中国对东南亚、日本输出的货物，长期是由福建人运销海外的。他们从海外输入香料与金银，并将中国的商品输出海外，对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福建是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的津梁。况且，由于福建人在环中国海区域的历史地位，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及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长期是由福建人经营的。在东南亚近一千年的历史，到处都有福建人的身影，他们在东南亚成为商人、官员、酋长、国王，对当地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研究中国对外交通史与海洋发展史，肯定离不开对福建人的研究。第五，福建省从宋代开始就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文化大省，每一届科举考试，福建都有许多人进士及第，在各省中位列前茅。不论在任何文化领域，都有福建人做出杰出的成就。宋代的李纲、朱熹、郑樵、苏颂、宋慈、柳永、刘克庄、袁枢，明代的李贽、黄道周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近代以来，福建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主要区域之一，严复、林纾、辜鸿铭、林语堂都是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著名人物。第六，自明

清以来，台湾海峡就是东亚政治的焦点之一，倭寇对东南沿海的袭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殖民者对台海两岸的图谋，都使福建成为抗击海外侵略的第一线，福建历史上产生了俞大猷、郑成功、林则徐等民族英雄，不是偶然的。同时，与海外的关系也使福建深深地卷入东亚世界史发展的进程，所以，深入研究福建区域史，不仅有地方史的意义，还有世界史的意义。

《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第一卷）》主要研究从远古时代到六朝的福建历史。在福建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可以上溯到十八万年以前的旧石器遗址，它的发现，将福建、台湾境内的旧石器文化联系在一起，在闽台旧石器文化研究方面有重要意义。福建境内，早在五千年前，就有昙石山新石器文化产生，这一文化遗址与河姆渡遗址一样，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水稻文化在东南区域的发生，它是构成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秦汉之际在闽中发展的闽越国文化，凝聚了秦汉时代物质文化发展的成果，武夷山出土的器物表明：西汉初年，闽越的物质文化具有很高的水平。只是这一时代闽越人的北迁，使闽文化发展进程被打断，此后长期落后于中原区域。迄至吴、晋、宋、齐、梁、陈六朝统治时期，闽文化缓慢地、曲折地向前发展，同时展开了汉文化与土著文化交融的进程。

《福建通史·隋唐五代（第二卷）》以隋、唐、五代的福建为研究对象，这是福建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时代。大致说来，在唐以前，福建人口稀少，隋代福建仅有12 420户，盛唐的福建也只不过10万户人家。但是，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民众大举南迁入闽，使福建人口大幅度增长，汉民族与土著民族实现了文化与血缘上的彻底交融，从而形成了新的福建人。五代时期，福建的经济文化逐步赶上中原区域的一般水平，并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福建通史·宋元（第三卷）》的研究对象是福建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朝代——宋元时代，福建在国内的经济、文化地位日益重要。

宋元时代的泉州港，是东方第一大港，也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它在世界贸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代也是福建文化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有 7000 余人成为宋朝的进士，其中在朝廷中任职宰相的官员达 50 多位。在科技方面，宋代福建有编纂《武经总要》的曾公亮，有在天文学上有卓越建树的苏颂，有法医学开山祖宋慈，还有在植物学上有重大成果的蔡襄；在文学方面，有杨亿、柳永、张元幹、刘克庄等名家；在史学方面，有郑樵、袁枢等大师。宋代闽人在理学方面的研究最引人注目，杨时、游酢、胡安国、胡寅、罗从彦、李桐、朱熹、陈淳、蔡元定、黄榦等大师级的人物荟萃东南，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朱熹综罗百代的气魄，致精致微的研究，被誉为孔子以后儒学最重要的人物，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之，宋元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宋元时期福建经济文化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其实说明了她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福建通史·明清（第四卷）》向读者展示了明代福建卷入世界海洋史的历程，1840 年以前的清代，仍是这一历程的延续。在明代以前，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都是来自北方的内陆区域，而从明代开始，中国的沿海，也有了外来势力的侵扰。福建地处中国的海疆前哨，从明初的海禁、郑和下西洋，到明代中叶的倭寇，以及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带来的贸易与战争，在台湾海峡发生的一切，都有全国性的影响，有时也成为世界各国矛盾的焦点。南明在福建沿海抗击清廷的战争延续 40 年之久，郑成功收复台湾，都显示了中国海商力量的强大。由于世界贸易体系的初步形成，当时的福建人将中国生产的茶叶、白糖、丝绸运销日本及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换取了大量的白银，白银涌入中国，从而引发了中国的货币革命，商品经济也比宋元时代有一个明显的跃进。为了制止白银流向中国的趋势，英国殖民者运来鸦片，终于引发了鸦片战争。

《福建通史·近代（第五卷）》研究了五四运动以前 80 年间福建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在五口开放之初，武夷茶的输出使福建成为国内少数几个对外贸易有盈余的省份，当时福建经济的繁荣在东南数省首屈一指。然而，随着 1888 年武夷茶对英国出口的结束，进口商品日益增多，福建逐渐成为一个人超的省份，传统手工业日益凋敝，近代工业发展坎坷。唯独在文化方面，由于马尾船政学堂与教会学校的举办，福建成为国内较早引进西式教育的地方，中国最早一批科学家与工程师中，有许多是福建人。林则徐、严复、林纾、辜鸿铭等人在中西交流史上的贡献尤为突出。

总之，虽说福建的开发史不像中原区域那样悠久，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在发展传统文化方面，在推动汉文化进一步南播方面，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都有自己卓越的成就，从而在中华文化诸多的区域文化系统中，显示了自己的特色。从这一点来看，对福建史的研究是必须深入的。

在本书的研究与撰写过程中，我们力图为学术界提供一部系统的福建通史，尝试全面地、充分地说明福建历史发展的因果、演变的轨迹，并力图阐明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首先，我们试图全面地反映各阶段的福建史。以往的地方史撰写，大都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已经有人研究的部分，地方史写得较为详细，较少研究的部分，作者也进行回避。这是由于以往的作者往往将通史当做现有成果的综汇，缺少独立开创的勇气。在本书撰著之前，福建史研究领域里，作过较多的是宋元泉州港研究、明清福建经济史研究、郑成功海商集团研究，我们的《福建通史》若只写这些问题，虽然轻松，但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决心写一部较完整的福建历史，便要将学术界对福建史部分问题的研究扩展到长时段的福建史研究，扩展到全面性的研究。以考古阶段的福建史来说，人们对石器时代的福建史研究较为充分，对青铜时代的福建史则罕有研究，但我们撰写早期的福建史，却不能漏掉

青铜时代而专写石器时代。再以六朝时期的福建史来说，由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展开不足，而文献史料又极为稀罕，撰写六朝福建史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我们在精研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及有限的文献史料后，较令人满意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再如，隋唐五代的福建史，以往的研究也是十分不足的，本书作者结合正史与地方史资料，加上发掘的文物与碑铭等史料，终于完成了一部近 30 万字的隋唐五代福建史，将这一时段的福建史全面展现于读者。对宋元以后的阶段，虽然有了较多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多偏重于某些方面，而对宋代福建社会全方位的研究，对元代福建史的研究，对明代早期福建史的研究，对近代福建史的全方位研究，都是十分缺乏的，我们都补足了这些方面。因此，我们的许多研究带有原创性。

其次，我们试图让读者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多方面详细地了解福建历史的全貌。本书不仅畅写福建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对福建地方制度的沿革也下了一番功夫，力争全面反映福建的地方制度史。本书对福建文化史也倾注了较多的力量，这是因为，福建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表现在文化方面，漏了文化史，就像一部交响乐失去了它的主旋律。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着力于福建历史影响较大的社会变化。经济史是本书的重点之一，我们将相当部分的篇章用于福建经济发展史的论述，并对福建最有特色的对外贸易史倾注较多的精力。

再次，充分吸收本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近十年来，福建区域史的研究发展较快，例如对明代福建海外贸易的研究，对福建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以及青铜文化的研究，几乎每年都有新成果与新发现问世。我们随时关注着这些领域的进展，尽量将其吸收进我们的通史。不过，由于通史的特性，我们对学术界有重大分歧的各种观点，尽量持中立、两不偏废的态度。关于冶城是否在福州、天地会发生于清初康熙年间还是清代中

叶乾隆年间，国内形成了两大流派的观点。无论是哪一流派，目前都还未能说服对方。就发展趋势看，两派的分歧还将流行一段时间。对这两大争议问题，我们介绍争议的来源，也表明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观点就是最终的观点，还是让读者自行判断，等待新的史料发现再做结论。

在撰写《福建通史》的过程中，我们立意将此书做成一部规范的学术著作。因此，首先，我们要求各位作者重视前人的成就，若有引用前人的观点，一定要注明出处；即使我们参考了某人的成果，但又不赞成他的观点，也要在参考书中列入他的成果。其次，我们要求作者每引证一条史料，都要注明版本、卷数、页码。由于本书的开创性，本书所引史料大都来自对原著的直接阅读；其中一些流行的史料，已经被许多著作引用，但因其重要性又是本书所无法舍弃的，我们都认真地进行了原著的核对，并注明了版本和页码。这一工作虽然烦人，但使我们得益不少——当我们对许多流行的史料进行认真校对后，发现其中有许多讹讹，乃至原意有所变化。历史学应当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对史料的校对使我们自信心大大加强了。

以上说到的几点，其实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我们力争比前人做得更好一些，但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本书一定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还有待于读者与同仁的批评指正。

福建社会科学院想做《福建通史》由来已久。1987年福建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福建通史课题组，由副院长刘学沛先生主持，并得到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办的支持，确立为福建省“七五”规划重点项目。1995年，刘学沛先生从福建社会科学院调任福建省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重组《福建通史》课题组，并决定由我担任《福建通史》主编，负起通史编撰的全责。面对这项缺经费、缺人手的项目，当时我犹豫再三，然而，对通史的爱与执著使我最终接受了这一任务。在领导的安排下，我们本着

自愿的原则重组福建通史课题组，参加本课题的有徐晓望、杨彦杰、刘大可、陈存洗、陈龙、杨琮、梅华全、林蔚文、林中淦、陈遵沂等十位同志。同年，重组后的《福建通史》课题列入福建省“八五”社科规划增补项目。

我从1989年春调入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后，便以福建通史的撰写为主要工作。在1995年以前，已经完成了五代部分、元代部分与明代部分的初稿。1996年之后，又增写了宋代部分、1840年以前的清代部分。五卷本的《福建通史》中，我撰写了隋唐五代卷与明清卷的全部以及宋元卷的大部分，在第一卷中，我也增补了个别章节。在这里我要感谢朋友们、同志们的一贯支持，他们帮我撰写了许多关键的部分，从而使该书得以成型。如果没有这些专家们的参与，这些关键的部分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精彩！福建省博物馆的同志由陈存洗研究员带头，与梅华全、林蔚文研究员协力完成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部分；由陈龙研究员全力负责，完成了青铜时代部分；由杨琮研究员带头，与林中淦研究员共同完成了闽越国部分与六朝的大部分。本书第一卷的完成，主要是他们的辛劳。福建社会科学院的杨彦杰研究员带头与现已调至福建省委党校的刘大可副教授合作，共同完成了《福建通史·近代卷》30多万字。此外，福建省委党校的陈遵沂教授为本书第三卷宋元卷撰写了宋代文化部分。今天《福建通史》终于完稿，要感谢多年来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同时要感谢福建社会科学院杨华基等领导同志给予“福建通史课题组”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刘学沛主任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在此并对所有关心支持福建通史课题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福建山川的雄壮秀丽不亚于五岳名山，登上这些大山展望四周的林海、山岭、河流、海洋，胸襟为之开阔，思潮为之澎湃。我想，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给福建漫长的文化史增添一砖一瓦而已，福建历史上有多少才俊之士，他们的贡献将福建文化筑成一座雄伟